

## 青少年憂鬱的代間傳遞： 個人、家庭與學校保護性因子之相關研究

江守峻、許立亞、劉宗幸、陳婉真

### 摘要

本研究係探討在青少年憂鬱的代間傳遞中，自尊、親子關係與學校歸屬感之個人、家庭與學校保護性因子，對於憂鬱代間傳遞之影響程度，並分析三項保護性因子於代間憂鬱之間扮演的調節角色。研究資料來自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Taiwan Youth Project），研究對象為 2,851 位國三青少年及其父母親，包含青少年子女自填問卷與青少年父母自填問卷。資料分析分為描述性統計、相關分析與多元迴歸分析。女性、親代憂鬱症狀愈嚴重者，其青少年子代的憂鬱症狀得分愈高，而父母性別、家庭狀況則與子代憂鬱無顯著相關。在保護性因子中，青少年的自尊、親子關係以及學校歸屬感可直接降低其憂鬱症狀程度，其中，自尊、親子關係與親代憂鬱症狀的交互作用達到顯著，亦即自尊與親子關係可緩衝親代憂鬱症狀對於子代憂鬱症狀的負面影響。

**關鍵字：**代間傳遞、保護因子、青少年憂鬱

---

江守峻，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生（本文通訊作者）

許立亞，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生

劉宗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陳婉真，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E-mail：chiangshouchun1@gmail.com

## 壹、緒論

近年來，青少年族群中的憂鬱情況已逐漸加劇，研究顯示罹患憂鬱之青少年族群容易出現嗜睡、暴食、偏差行為甚至自殺傾向等有害身心健康之行為（王迺燕、林美珠、周兆平、溫環椿，2011；謝佳容、張珏，2003）。過去研究指出，父母親的心理健康會影響著青少年子女的心理健康，甚至成為憂鬱的代間傳遞（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depression），學者認為此憂鬱的代間傳遞意味著子女的憂鬱症狀與父母親憂鬱有密切關係，故可能形成一種親代與子代之間憂鬱症狀的直接傳遞現象（Hammen, Shih, & Brennan, 2004）。然而，綜觀國內現有文獻，可以發現探討憂鬱代間傳遞的相關學者並不多，一部分可能是由於資料蒐集的困難度，研究者需要同時調查父母與子女的憂鬱情形，所需花費的成本與時間頗高，另一部分則是代間傳遞理論尚未被廣泛地討論，只有少數學者以代間傳遞的觀點剖析家庭暴力、婚姻不穩定或教養行為等家庭因素在不同世代的傳遞情況（孫頌賢、李宜玫，2009；陳韻如，2013；齊雪芬、何慧敏，2015）。因此，為了瞭解國內青少年憂鬱的代間傳遞是否存在，本研究將運用國內的大型研究資料分析父母親的憂鬱症狀與青少年子女的憂鬱症狀之關聯。

儘管憂鬱會透過代間傳遞而延續至下一代，但仍有許多因子能幫助子代減緩代間傳遞的負面效果。許多學者致力於探討導致青少年憂鬱的相關因素，分別從不同的層面分析內外因子對於青少年憂鬱的意義，例如個人特質的自尊、完美主義（蘇曉憶、戴嘉南，2008）；家庭環境的雙親教養態度、家庭功能（林耀盛、李仁宏、吳英璋，2006）；學校環境的社會資本（李思賢、張弘潔、李蘭、吳文琪，2006）。本研究企圖採取生態系統的觀點，探討在個人層次、家庭層次與學校層次三者中，有利於降低青少年憂鬱的保護性因子（protective factor），探討個人系統、家庭系統和學校系統中在憂鬱的代間傳遞中的可能影響因子。

Bronfenbrenner（1979）提出「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 Theory）並於後續研究中說明影響個體發展的環境可分為四個系統，這四個系統分別為（王麗斐等人，2013；李佩珊，2019）：（1）微觀系統（microsystem），（2）中間系統（mesosystem），（3）外在系統（exosystem），及（4）巨觀系統（macrosystem）。綜合上述，本研究中的自尊屬於微觀系統，探討個人內在層面的自尊程度與憂鬱代間傳遞之關係，家庭親子關係和學校歸屬感則屬於中間系統，涉及青少年個體所身處的環境脈絡，及兩者對於憂鬱

代間傳遞之意義。一方面，探究在父母憂鬱與子女憂鬱之間可能的保護性因子，檢視哪些因子能減少憂鬱代間傳遞的不利影響；另一方面，比較不同系統在形塑或減緩青少年憂鬱的可能性與內涵，藉此擬定出合適的學校輔導策略與教育方針，強化青少年憂鬱之預防工作及介入措施。

## 一、青少年憂鬱的代間傳遞

憂鬱的代間傳遞意指憂鬱的父母與子女互動過程中，將憂鬱傳遞給子女，造成子女的憂鬱症狀增加，甚至被診斷為憂鬱症的現象（Goodman & Gotlib, 1999）。學者發現憂鬱透過代間傳遞使得子女暴露在更高的憂鬱風險中，且其子女成年後會擁有較低的親密關係品質與較高的人際壓力，並且造成心理健康危害（Goodman et al., 2011; Katz, Hammen, & Brennan, 2013），是故親代與子代之間的憂鬱代間傳遞對於子女之影響甚遠。在一項 20 年的追蹤調查中發現，與非憂鬱父母的子女相比，有憂鬱病史的父母其子女發生焦慮症、重鬱症和物質依賴之風險遠高於非憂鬱父母的後代子女之三倍，說明父母的憂鬱情形對於子女心理健康所造成的重大影響（Weissman et al., 2006）。另一項研究指出，與沒有憂鬱的母親相比，有憂鬱病史的母親其子女有兩倍的機率在 15 歲以下被診斷憂鬱症（Hammen & Brennan, 2003）。此外，憂鬱的父母其子女更容易出現內疚感、人際關係困難以及依附問題（Beardseele, Versage, & Gladstone, 1998）。並且，子女的不適應行為與對世界的負向認知會進一步增加對於憂鬱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造成心理健康的危害（Katz et al., 2013）。以上研究皆顯示，憂鬱的父母確實容易導致其子女心理及行為上的眾多負面影響，且有更大的可能性有較高的憂鬱症狀或甚至被診斷為憂鬱患者。

許多學者試圖理解憂鬱的代間傳遞是如何發生，Hamman（1991）提出壓力生成模式（Stress Generation Model），認為個體會透過不斷選擇或創造有問題的人際關係而產生更多壓力，最終導致憂鬱的循環，後續的研究支持此一模式，發現憂鬱的父母會導致兒女傾向選擇較低品質的親密關係，導致更多的親密關係困難最終增加子女憂鬱的風險（Katz et al., 2013）。接著，Hammen（1999）更進一步地提出了憂鬱代間傳遞人際壓力模型（interpersonal stress model of depression transmission），該模式認為憂鬱的母親通常會有較差的人際交往能力以及較高的人際壓力，此人際互動模式亦會傳遞給子女，便是造成憂鬱代間傳遞的起因。後續的研究證據支持該假設，並且進一步指出充滿壓力的家

庭互動與人際壓力更能夠解釋憂鬱的代間傳遞現象 (Hammen et al., 2004)。由此顯示，家庭因素對憂鬱之影響程度相當關鍵。目前愈來愈多的學者關注憂鬱代間傳遞的家庭互動過程，強調後天環境對於子女心理健康的影響性，其中家庭功能、教養方式、親子關係以及互動品質等，都是影響憂鬱代間傳遞至子代的重要因素之一 (丁思惠、陳喬琪，2006；Goodman et al., 2011)。具體來說，現今學者認為造成憂鬱症狀代間傳遞的主要原因包含兩個層面：

(一) 高壓力的家庭環境：許多文獻指出，青少年面臨憂鬱症的風險，是持續暴露於失功能的高壓力家庭環境之後果 (Sheeber, Hops, & Davis, 2001；Goodman & Gotlib, 1999)。憂鬱的母親經常導致他們的子女在童年或出生前承受很大的壓力，根據研究顯示，在生命的第一個十年中任何時刻經歷過一次母親憂鬱症的兒童，其在青春期罹患憂鬱症的風險增加 (Hammen, 2002；Hammen & Brennan, 2003)。與沒有憂鬱的父母相比，憂鬱父母的子女表現出更多消極、敵意或疏離的教養模式，最終導致子女的多重問題，或是僅就衝突本身也會直接導致兒童憂鬱症狀加重 (Cummings, Keller, & Davies, 2005；Hammen et al., 2004)。

(二) 負面人際交往功能：人際關係過程在憂鬱的代間傳遞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隨著兒童與青少年的發展，父母會提供反饋、楷模與學習，幫助他們理解和解釋生活事件的意義，子女透過互動溝通的過程，習得父母的負向認知風格 (negative cognitive style) 與心理狀態 (affect)，最終導致情緒障礙風險與憂鬱症狀風險增加 (Goodman & Gotlib, 1999；Mezulis, Hyde, & Abramson, 2006)。此外，母親的人際關係缺陷也會直接導致子女的壓力，並且透過目睹母親的不良的社交模式，而學習到無效的人際技巧，最終在生活中導致更多人際壓力及憂鬱症狀 (Hammen et al., 2004；Hammen, 1991)。

總結來說，父母的憂鬱能夠預測子女的憂鬱，其原因可能是由於遺傳、環境、或是透過社會學習來傳遞，憂鬱的父母使得子女在這樣充滿壓力及衝突的家庭環境下，習得並且內化與憂鬱父母的負向認知風格，以及失功能的人際交往模式，促成了憂鬱症的危險因子，導致其子女有憂鬱症狀的可能性增加。

## 二、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影響因素

### (一) 個人層面：自尊

自尊 (self-esteem) 意旨個人對於自我的主觀評價與感受，能夠反映出整體的自我

價值（林杏足，2003；Coopersmith, 1981；Donnellan, Trzesniewski, & Robins, 2011；Rosenberg, 1965）。自尊在教育與心理領域中，一直以來都是重要的構念，許多研究者將自尊視為心理健康的指標之一（Rosenberg, Schooler, Schoenbach, & Rosenberg, 1995）。自尊是人類的基本需求（Branden, 2001）更是青少年發展時非常重要的健康指標，研究發現正向自尊能夠作為預測青少年能否面對挑戰的指標，以及學業表現與未來生活滿意度（Rosenberg et al., 1995；Moksnes & Espnes, 2013）。另一方面，擁有負向自尊的青少年較容易產生敵意反應（Kernis, Grannemann, & Barclay, 1989），且與學業表現不佳、輟學、青少年犯罪、憂鬱有關（蔡宗晃、詹毓玫、李家順，2011）。

上述文獻皆顯示自尊對於其青少年發展的有著重大的影響。脆弱模型（vulnerability model）表明對自我的負面評價會構成憂鬱的風險因素，亦即低自尊不僅是憂鬱症的症狀之一，也是一種造成憂鬱發作與維持的素質之一（Beck, 1967；Orth, Robins, & Robert, 2008）。此外，根據 Sowislo 與 Orth（2013）的結果發現低自尊對憂鬱確實有顯著的影響力，遠高於憂鬱對低自尊的效果，代表憂鬱係受到自尊之影響。李曉蓉（1997）發現青少年的自尊對沮喪具有預測力，當理想中的情況與現實中的情況愈不一致時，青少年愈易有低自尊的傾向，所以造成憂鬱。其他研究者也有相同的結論，發現低自尊能夠預測憂鬱程度（常欣怡、宋麗玉，2010；紀櫻珍等人，2010）。Rosenberg 與 Schooler（1989）進一步指出，自尊會對憂鬱造成影響，正向自我關懷（positive self-regard）是一項人類主要的動機，當缺乏其動機處於低自尊狀態時，產生憂鬱是必然的。從過去文獻得知，自尊對於青少年有著深遠的影響，當個體擁有正向自尊，能夠增加其適應性，更有能力面對生活中的挑戰。

## （二）家庭層面：親子關係

親子關係意指子女知覺到父母親的可及性、溝通開放性、信任感以及情感支持（Heaven, Newbury, & Mak, 2004）。長期以來，家庭中的親子關係在個體成長過程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親子關係對於子女的心理健康與行為表現都有明顯影響（Hair, Moore, Garrett, Ling, & Cleveland, 2008）。青少年時期，子女將面臨來自個人身心與外在環境上的轉變，父母親身為主要照顧者，是提供青少年情感支持與理解的重要人物，此時親子關係更顯得不可或缺，若父母親與子女間保持良好、穩定的親子關係，對於子女身心發展相當重要。一項研究顯示，約有四分之一的青少年表示無法與父母親討論自己所遇到

的問題，且當青少年知覺愈低的親子溝通與照顧程度時，會伴隨著較高的不健康體重、物質濫用、自殺企圖、對身材不滿與憂鬱（Ackard, Neumark-Sztainer, Story, & Perry, 2006）。

丁思惠與陳喬琪（2006）認為，父母親之間的婚姻不合並非是造成青少年憂鬱的主要原因，反而親子關係品質才是與青少年憂鬱有高度關係。親子關係不僅影響子女當下的憂鬱程度，對於未來心理健康也有持續性影響。Crook、Raskin 與 Eliot（1981）指出，孩子早期經驗到的親子關係與日後出現憂鬱症狀有密切關連，倘若父母親採取拒絕或退縮的方式與孩子相處，形成疏離、對立或低支持的親子關係，其子女在成年後可能產生較高的憂鬱症狀。綜上所述，親子關係能顯著預測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程度，親子關係愈佳則青少年憂鬱程度愈低（Boutelle, Eisenberg, Gregory, & Neumark-Sztainer, 2009；Ee & Arshat, 2017）。

### （三）學校層面：學校歸屬感

學校歸屬感係指學生對於所就讀學校的情感依附（attachment）、承諾（commitment）與參與（participation）（Jenkins, 1997）。Goodenow（1993）發展出「學校成員心理感受量表」（Psychological Sense of School Membership Scale, PSSM）作為學校歸屬感之測量工具，其認為學生的班級參與、學習投入，以至於在校的成功或失敗經驗，並非僅受到個人因素如人格特質、學業能力的影響，而亦與環境因素有密切關係，尤其是學生在校的社會關係與連結，例如連結感、肯定感、受到鼓勵與接納等學校層面之環境脈絡。並且，在「國際學生能力評比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當中，已將學生對於學校之歸屬感（sense of belonging at school）納入評量指標，可用以預測學生未來的學習表現與中輟問題（Willms, 2003）。

過去研究顯示，學校歸屬感有利於青少年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降低青少年的憂鬱情形（Pittman & Richmond, 2007）。阮孝齊（2015）表示，學生在學校場域中學習的過程中，對學校之歸屬感其實對於教育效果有著莫大影響力，學生透過歸屬感建立自信、意義。Osterman（2000）表示，學生時期的兒童與青少年對於外在環境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就是歸屬感經驗，而學校在此時期應發揮其正面功效，使學生在校園內能透過不同活動與參與，產生高度學校歸屬感，如此一來便可同時有效減少學生的外在與內化問題。Anderman（2002）的研究結果指出，學生知覺的學校歸屬感能降低其憂鬱症狀，並且在

被分類為高學校歸屬感的學校，個別學生知覺的學校歸屬感對於憂鬱之影響程度下降。換言之，當學生身處於同儕也是高學校歸屬感的情況時，學校歸屬感的重要性便會下降，不過就另一個角度來看，若學生來自低學校歸屬感的學校時，則學校歸屬感便能扮演降低憂鬱症狀的重要角色。一項以移居美國的難民青少年之研究顯示，不論過去所遭遇的災難程度，學校歸屬感與青少年憂鬱程度均呈現顯著負相關 (Kia-Keating & Ellis, 2007)。

### 三、自尊、親子關係與學校歸屬感在憂鬱代間傳遞的保護作用

青少年憂鬱的保護因子意味著能夠使青少年在危險情境下對負面影響有緩衝、調節的效果 (Hawkins, Catalano, & Miller, 1992)。過去探討青少年憂鬱保護因子之研究，大多聚焦在對於負面不利因子與憂鬱之間的調節效果，較少檢視保護因子在憂鬱代間傳遞所扮演的角色 (王齡竟、陳毓文, 2010; 陳毓文, 2004; Costello, Swendsen, Rose, & Dierker, 2008; Dumont & Provost, 1999)。Werner (1997) 曾提出能夠讓孩子在惡劣環境下的保護因子，主要可以由三個層面來檢視，分別是個人層面、家庭層面、社會層面，以下分述之：

人格特質中的自我概念為憂鬱重要的保護因子，根據文獻回顧發現，自我概念影響青少年的心理適應與心理福祉 (Colarossi & Eccles, 2003; Rosenberg et al., 1995; Werner, 1997)。研究顯示，在高犯罪的社區中生長的孩子，若能保有高自尊與責任感的人格特質，成年後將會有較低的犯罪率，也較容易有良好的社會適應 (Donnellan, Trzesniewski, Robins, Moffitt, & Caspi, 2005)。

接著，家庭與學校是主要人際互動場域，也是影響青少年發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在家庭層面，研究發現親子關係是青少年憂鬱重要的保護因子之一，儘管某些孩子的父母有精神疾患或甚至虐待的情形，然而在高風險家庭下仍然適應良好的孩子，他們至少與一位能夠穩定滿足孩子需求的大人保持連結，藉此發展信任感，緩衝在負面環境下所帶來的傷害 (Young, Berenson, Cohen, & Garcia, 2005; Werner, 1997)，顯示出親子關係對於青少年身心發展的重要性。

在學校層面，青少年在學校團體生活中塑造了人格特質、價值觀，學校場域中的互動會影響到學生的人際關係、學習動機與身心狀況 (Roeser, Eccles, & Sameroff, 2000)。研究顯示學生知覺學校歸屬感的程度，與憂鬱、社會拒絕、和學校問題呈負相關 (Anderman, 2002)。也就是說，擁有越高學校歸屬感的學生，傾向於擁有更正向的自我

知覺與較少心理困擾 (Pittman & Richmond, 2007)，其他研究指出班級氣氛會影響青少年的自尊及情緒，氣氛好壞會對青少年的自我概念與情緒產生調節 (黃韞臻、林淑惠，2008；Galini & Efthymia, 2009)。

總而言之，上述文獻顯示自我概念、親子關係與學校歸屬感是青少年憂鬱症狀的保護因子，本研究將進一步檢視三者是否也能減緩親代憂鬱對於子代憂鬱的不利影響，亦即分析自我概念、親子關係與學校歸屬感在憂鬱代間傳遞中的正向保護作用。

## 貳、研究方法

###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係使用中央研究院所執行之「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Taiwan Youth Project, TYP) 作為本研究資料，TYP 由伊慶春教授總主持，始於 2000 年 (伊慶春，2014)。TYP 係採用分層的多階層叢集抽樣，第一層為縣市單位，第二層為鄉鎮單位，分層後再進行叢集抽樣。本研究對象分為兩個部分：一者為國三樣本第一波之青少年父母親，青少年父母親人數共計 2,800 人；二者為國三樣本第一波之國中青少年，青少年樣本人數計 2851 人。

因此，本研究以國三樣本第一波之父母自評量表，作為測量父母之親代憂鬱症狀使用，以及國三樣本第一波之青少年 (子女) 自評量表，作為測量青少年之子代憂鬱症狀、自尊、親子關係滿意度與學校歸屬感使用。

### 二、背景變項

過去研究顯示，性別與家庭狀況可能是影響青少年憂鬱的背景因素 (Anderman, 2002)，因此本研究納入父母性別、子女性別與家庭狀況三者作為背景變項，如表 1 所示。在父母性別方面，青少年父親之男性人數為 911 人，青少年母親之女性人數為 1816 人，遺漏或未答者 124 人。在子女性別方面，青少年之男性人數為 1428 人，青少年之女性人數為 1374 人，遺漏或未答者 49 人。在家庭狀況方面，參考陳婉琪與徐崇倫 (2011) 之作法將家庭狀況分為完整家庭 (雙親家庭) 與不完整家庭 (單親家庭、繼親家庭等) 兩類，完整家庭為 2690 人，不完整家庭為 111 人，遺漏或未答者 50 人。



表 1

研究對象之背景資料

背景變項	內涵分類	人數統計
父母性別	男性	911
	女性	1816
	遺漏或未答	124
子女性別	男性	1428
	女性	1374
	遺漏或未答	49
家庭狀況	完整家庭	2690
	不完整家庭	111
	遺漏或未答	50

### 三、測量變項

#### (一) 親代憂鬱症狀

親代憂鬱症狀之測量係使用 TYP 父母自評量表中的自陳式症狀檢核表 (The Symptom Checklist-90-Resvised) (Derogatis, 1983)。由於父母自評量表與子女自評量表題目並不完全相同，本研究採用完全相同題目的題目，共計 16 題，量表 Cronbach'  $\alpha$  信度為 .93，顯示本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題目內容涉及受試者一周內的憂鬱身心症狀，例如「頭痛」、「鬱卒」、「擔心過度」與「失眠，不易入睡」等等。計分方式為 Likert 五分量表，5 分代表「有，很嚴重」、4 分代表「有，嚴重」、3 分代表「有，普通」、2 分代表「有，有點」，1 分代表「沒有」，分數愈高代表父母親的憂鬱程度愈高。

#### (二) 子代憂鬱症狀

親代憂鬱症狀之測量係使用 TYP 子女自評量表中的自陳式症狀檢核表 (The Symptom Checklist-90-Resvised) (Derogatis, 1983)，題目共計 16 題，量表 Cronbach'  $\alpha$  信度為 .77，顯示本量表具有可接受的信度。計分方式採 Likert 五分量表，由高至低依序為「有，很嚴重」、「有，嚴重」、「有，普通」、「有，有點」與「沒有」，題目包括「頭痛」、「鬱卒」、「擔心過度」以及「失眠，不易入睡」等等，分數愈高代表青少年的憂鬱程度愈高。

#### (三) 自尊

自尊之測量係使用 TYP 子女自評量表中的自尊檢核量表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RSES) (Rosenberg, 1965)，題目共計九題，量表 Cronbach'  $\alpha$  信度為 .88，顯示本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計分方式為 Likert 四分量表，4 分代表「很同意」、3 分代表「同意」、2 分代表「不同意」、1 分代表「很不同意」。題目內容涉及受試者一周內的自尊程度，包括「我沒有辦法解決自己的某些問題（反向題）」、「我用積極樂觀的態度看待我自己」等等，分數愈高代表其自尊程度愈高。

#### (四) 親子關係滿意度

親子關係滿意度之測量係使用 TYP 子女自評量表中的親子關係評量，題目共計兩題，量表 Cronbach'  $\alpha$  信度為 .72，顯示本量表具有可接受的信度。計分方式為 Likert 四分量表，4 分代表「很滿意」、3 分代表「滿意」、2 分代表「不滿意」、1 分代表「很不滿意」。題目內容為受試者與父母的親子關係，包括「我很滿意與父親的關係」和「我很滿意與母親的關係」，分數愈高代表其親子關係滿意度愈高。

#### (五) 學校歸屬感

學校歸屬感之測量係使用 TYP 子女自評對於就讀學校的歸屬感，題目共計三題，量表 Cronbach'  $\alpha$  信度為 .63，顯示本量表具有可接受的信度。計分方式為 Likert 四分量表，4 分代表「很同意」、3 分代表「同意」、2 分代表「不同意」、1 分代表「很不同意」。題目內容為受試者對於學校的個人感受，包括「我喜歡學校」或「我以我的學校為榮」等等，分數愈高代表其學校歸屬感愈高。

###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 SPSS 20 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使用次數分配、描述性統計、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與多元迴歸分析執行相關統計考驗。由於本研究使用多元迴歸分析檢驗保護性因子與親代憂鬱症狀之交互作用，而交互作用容易產生共線性問題 (Multi-Collinearity)，故本研究根據 Aiken、West 與 Reno(1991)建議採用置中平減法(centered)，亦即將自變項減去各自的平均數，再兩兩相乘為交互作用值，以避免模式中的共線性問題。

## 參、研究結果

### 一、描述性統計

四個測量變項的描述性統計，如表 1 所示。表中的全距與平均數為該測量變項題目之加總，首先，親代憂鬱症狀的平均數為 1.56，子代憂鬱症狀的平均數為 1.50，兩者顯示父母與子女皆為低憂鬱症狀狀態，再者，在三項保護性因子中，以青少年親子關係平均數最高（3.00），學校歸屬感次之（2.83），自尊最末（2.57）。另外，在常態分配方面，若偏態絕對值小於 3、峰度絕對值小於 10，則可宣稱符合常態分配（Kline, 1998）。由表 2 可知，本研究各測量變項的偏態值與峰度值皆符合標準，大致符合常態分配。

表 2

親代憂鬱症狀、子代憂鬱症狀、自尊、親子關係與學校歸屬感之描述性統計

	全距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1.親代憂鬱症狀	1~5	1.56	.54	1.560	3.105
2.子代憂鬱症狀	1~5	1.50	.54	1.844	4.609
3.自尊	1~4	2.57	.44	.022	.654
4.親子關係	1~4	3.00	.56	-.396	.587
5.學校歸屬感	1~4	2.83	1.42	-.453	.199

### 二、相關分析

青少年之親代、子代憂鬱症狀與各變項之積差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3 所示。首先，親代憂鬱症狀與子代憂鬱症狀有顯著正相關（ $r = .20, p < .01$ ），亦即當親代憂鬱症狀程度愈高，子代憂鬱症狀也愈高。再者，親代憂鬱症狀與青少年自尊（ $r = -.12, p < .01$ ）、親子關係（ $r = -.10, p < .01$ ）和學校歸屬感（ $r = -.05, p < .05$ ）皆有顯著負相關，顯示當親代憂鬱症狀較高時，子代青少年的自尊程度、親子關係與學校歸屬感皆會較低。最後，子代憂鬱症狀與青少年自尊（ $r = -.33, p < .01$ ）、親子關係（ $r = -.28, p < .01$ ）和學校歸屬感（ $r = -.17, p < .01$ ）皆有顯著負相關，也就是子代憂鬱症狀愈高，則其自尊程度、親子關係與學校歸屬感皆會愈低。

表 3

親代憂鬱、子代憂鬱、自尊、親子關係與學校歸屬感之相關係數矩陣

	1	2	3	4
1.親代憂鬱症狀	1			
2.子代憂鬱症狀	.20**	1		
3.自尊	-.12**	-.33**	1	
4.親子關係	-.10**	-.28**	.21**	1
5.學校歸屬感	-.05*	-.17**	.20**	.21**

註：\*  $p < .05$ , \*\*  $p < .01$

### 三、憂鬱症狀代間傳遞的保護性因子緩衝模式檢驗

#### (一) 模式一：檢視憂鬱症狀的代間傳遞

模式一顯示，預測模式已達統計顯著水準 ( $F = 39.54, p < .001$ )，模式解釋力為 6%。進一步檢視各預測變項之分析結果：三個背景變項中，父母性別對子代憂鬱症狀未有顯著影響 ( $b = .02, p > .05$ )，代表不同性別的父母對於子代憂鬱症狀之影響程度沒有顯著差異；子女性別對子代憂鬱症狀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 $b = .15, p < .001$ )，代表女性子女的子代憂鬱症狀顯著高於男性；家庭狀況對子代憂鬱症狀未有顯著影響 ( $b = -.06, p > .05$ )，代表不同家庭狀況對於子代憂鬱症狀之影響程度沒有顯著差異。接著，在控制上述背景變項，親代憂鬱症狀對子代憂鬱症狀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 $b = .19, p < .001$ )，顯示出親代憂鬱症狀程度愈高、子代憂鬱症狀也愈高的憂鬱代間傳遞情形。

#### (二) 模式二：檢視憂鬱症狀的保護性因子

模式二顯示，保護性因子模式已達統計顯著水準 ( $F = 83.97, p < .001$ )，模式解釋力為 19%。進一步檢視各保護性因子變項之分析結果：三個保護性因子對於子女憂鬱症狀都有顯著影響，由高至低依序為自尊 ( $b = -.29, p < .001$ )、親子關係 ( $b = -.15, p < .001$ ) 以及學校歸屬感 ( $b = -.06, p < .01$ )，顯示出青少年的自尊程度對於降低憂鬱症狀有著相當重要的意義，而親子之間的關係亦有助於青少年保持較低的憂鬱症狀，最後學校歸屬感影響力雖不及自尊與親子關係，但也對於保護青少年憂鬱症狀有所助益。

**(三) 模式三：檢視憂鬱症狀代間傳遞與保護性因子的交互作用**

模式三顯示，交互作用模式已達統計顯著水準 ( $F=61.62, p < .001$ )，模式解釋力為 20%。進一步檢視各交互作用變項之分析結果：三個交互作用變項中，有兩者達到顯著水準，包括：親代憂鬱症狀與自尊的交乘項 ( $b = -.12, p < .01$ )、親代憂鬱症狀與親子關係的交乘項 ( $b = -.08, p < .01$ )；但，親代憂鬱症狀與學校歸屬感的交乘項未達顯著水準 ( $b = .05, p > .05$ )。此結果顯示，在憂鬱症狀的代間傳遞上，自尊與親子關係扮演著緩衝者的角色 (buffering)，亦即子代保持著良好的自尊程度與親子間有良好的親子關係，皆能緩衝親代憂鬱症狀對於子代憂鬱症狀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學校歸屬感則無法減緩憂鬱症狀的代間傳遞，只具有直接影響子代憂鬱症狀之直接效果。簡言之，親代憂鬱症狀確實對子代憂鬱症狀有顯著地影響效果，不過若子代青少年能保持較佳的自尊與親子關係，將能減緩親代憂鬱症狀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表 4

**憂鬱症狀代間傳遞的保護性因子之階層迴歸分析**

自變項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b	SE	b	SE	b	SE
<b>預測變項</b>						
父母性別 (女=1)	.02	.02	.03	.02	.03	.02
性別 (女=1)	.15***	.02	.13***	.02	.13***	.03
家庭狀況	-.06	.06	-.03	.05	-.03	.05
親代憂鬱	.19***	.02	.14***	.02	.12***	.02
<b>保護性因子</b>						
自尊			-.29***	.02	-.29***	.02
親子關係			-.15***	.01	-.15***	.01
學校歸屬感			-.06**	.02	-.06**	.02
<b>交互作用</b>						
親代憂鬱x自尊					-.12**	.04
親代憂鬱x親子關係					-.08**	.02
親代憂鬱x學校歸屬感					.05	.03
模式顯著性	F=39.54*** R <sup>2</sup> = .06		F=83.97*** R <sup>2</sup> = .19		F=61.62*** R <sup>2</sup> = .20	

註：b 為未標準化係數；\*  $p < .05$ , \*\*  $p < .01$ , \*\*\*  $p < .001$

## 肆、結果與建議

### 一、研究結果

本研究結果發現，女性、親代憂鬱症狀愈嚴重，青少年子代的憂鬱症狀得分愈高，而父母性別、家庭狀況則與子代憂鬱無顯著相關。在保護性因子方面，青少年的自尊、與父母親的親子關係以及青少年知覺的學校歸屬感愈高，其憂鬱症狀得分愈低，這些結果與過去相關研究成果相符（Ackard et al., 2006；Sowislo & Orth, 2013）。並且，結合生態系統觀之相關論述（Bronfenbrenner, 1979），本研究檢視微觀系統之自尊，以及中間系統之親子關係與學校歸屬感，作為探究青少年成長之環境脈絡因子（contextual factors）（Brown, Cohen, Johnson, & Smailes, 1999）主要結果顯示自尊、親子關係與學校歸屬感三者確實能有效降低青少年的憂鬱症狀。以下進一步討論青少年的憂鬱症狀代間傳遞，以及自尊、親子關係與學校歸屬感的保護效果：

#### （一）青少年的憂鬱症狀代間傳遞

由於資料搜集的困難度，國內目前並無直接針對親代與子代憂鬱探究代間傳遞現象之實證研究。如同陳琬萱（2007）所面臨的困境，其子女憂鬱症狀的資料係由母親填答而成，並非子女個人填答，或是老師、心理專業人員之評估結果，所以子女憂鬱症狀的準確性還有待商榷。因此，本研究透過整理國內大型資料庫中的父母親問卷與青少年子女問卷，串連出父母與子女自評的憂鬱症狀，才得以實際分析憂鬱症狀的代間傳遞。本研究結果顯示，親代憂鬱症狀確實可以顯著預測子代憂鬱症狀，證實憂鬱的代間傳遞理論存在（Hammen et al., 2004）。Garber 與 Cole（2010）提出「起始與成長模式」（launch and growth model），解釋在青少年族群中的憂鬱症狀代間傳遞現象，其認為母親憂鬱症狀係一早期危險因子（early risk factor），將導致子女在成長過程中有較高機率暴露在充滿不利因素的環境當中，包括較差的家庭關係、自我價值與情緒壓力等等，進一步導致子女有更高的可能性發展出憂鬱症狀。此外，憂鬱代間傳遞與華人文化亦有所關聯，過去研究指出相較於西方個體主義的社會文化，在華人集體主義的背景下，父母親與子女的緊密相依反而是一正向力量，也就是若父母給予子女較多的獨立與較少的干涉控制時，子女反而有較高的憂鬱症狀，故該研究結果顯示低家庭獨立性可預防子女發展出憂鬱症狀（陳琬萱 2007）。是故，本研究在控制了父母性別、子女性別與家庭狀況後，仍

發現親代憂鬱症狀可以顯著地預測子代憂鬱症狀，證實親子憂鬱的代間傳遞現象，並且也進一步探討有助於降低此代間傳遞的相關保護性因子。

## (二) 自尊的保護效果

本研究結果指出，青少年的自尊不僅可以有效降低其憂鬱症狀程度，也能夠減緩親代憂鬱症狀帶來的負面影響，作為憂鬱代間傳遞的緩衝因子。有學者認為，個體內在的自尊將培養出一個人對於自我的完整性、秩序性與生存意義，於是隨著年齡增長，自我價值受到父母親的影響程度會逐漸降低，發展成倚靠自我的獨立個體（Rounding, Hart, Hibbard, & Carroll, 2011）。Baumeister、Campbell、Krueger 與 Vohs（2003）指出，過去有部分學者認為高自尊未必完全是一良好正向的心理素質，原因在於高自尊者往往較容易誇大正向感受、僅專注在好的結果上與缺乏客觀的自我認知等等，所以自尊愈高不一定代表個體有較佳的心理健康。不過，其研究團隊回顧眾多自尊的研究文獻後，發現高自尊與自戀人格有低度的關聯性，但高自尊者在遭受貶損時，並不會像高自戀者一樣出現較高的攻擊性，而且高自尊者也經常伴隨著較高的溝通意願、人際技巧和關係品質，在遇到挫折、壓力時也因此較能從他人身上獲得支持和有效的建議，所以依舊總結出高自尊是兒童與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保護性因子。總而言之，本研究支持上述文獻評閱的結果，發現青少年的自尊有助於降低憂鬱症狀的代間傳遞，自尊的保護效果獲得證實。

## (三) 親子關係的保護效果

過去研究指出，夫妻之間的情感關係未必與青少年憂鬱有關，反而是親子之間的關係才是主要的影響因素（丁思惠、陳喬琪，2006）。在本研究結果中，親子關係的保護效果獲得支持，儘管在直接影響上親子關係的迴歸係數略小於自尊，但在交互作用上親代憂鬱症狀與親子關係的乘積項係數卻大於親代憂鬱症狀與自尊的乘積項係數，顯示出親子關係於憂鬱代間傳遞上具有重要的緩衝作用。不過，本研究與陳毓文（2004）的研究結果略所差異，該研究發現父母支持和家外成人支持對於青少年憂鬱無顯著影響。研究者認為其原因有二：第一，該研究係以低自尊、父母衝突和家庭經濟壓力三者作為危險因子，檢視父母、同儕與家外成人的支持，而本研究中的危險因子則為親代憂鬱症狀，故在參與的測量變項上已有所不同，同時也顯示出本研究納入親子關係作為憂鬱症狀代間傳遞之測量變項有其重要意義。再者，親子關係有助於減緩親代憂鬱症狀對子代憂鬱症狀的負面影響，意味著即使與有憂鬱症狀的父母親接觸較頻繁、親子關係較緊密，並

不會對青少年子女的心理健康造成負面影響，反而是父母親的拒絕與疏離才是導致憂鬱代間傳遞之關鍵所在（Whitbeck, Hoyt, Simons, Conger, Elder, Lorenz, & Huck, 1992）。因此，親子關係對於親子之間的憂鬱症狀代間傳遞扮演著緩衝作用的角色，有利於減少親代憂鬱症狀所帶來的負面效果。

#### （四）學校歸屬感的保護效果

學者指出，在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畫（PISA）中學生的學校歸屬感已儼然成為重要的評估指標之一，並且是影響學生心理健康的不可忽略之一環（阮孝齊，2015）。可是，綜觀國內相關的研究文獻，將發現缺乏學生對於學校的歸屬感之相關議題討論。Shochet、Dadds、Ham 與 Montague（2006）表示，心理健康與學生對於學校的連結、歸屬感之關係經常被學者們所忽視，大多都是分析學業表現、學業成就等外在表現，實際上學生對於學校的情感認同是影響其在校心理適應的關鍵所在。因此，本研究結果顯示學校歸屬感與青少年的憂鬱症狀有關，學校歸屬感愈高，則青少年的憂鬱症狀程度愈低，代表青少年對於學校有較高的認同、喜歡及情感依附時，憂鬱症狀也能隨之降低。不過，在交互作用的檢驗上，學校歸屬感並不能減緩親代憂鬱症狀對於子代憂鬱症狀的關係，亦即學校歸屬感無法緩衝親代憂鬱症狀對於青少年心理健康之負面影響。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可以補足現有國內文獻之缺口，說明學校歸屬感係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的預測因子之一，值得未來學者更多的關注與討論。

## 二、實務與研究建議

### （一）強化自尊、親子關係與學校歸屬感有助於青少年心理健康

首先，本研究顯示青少年的自尊對於降低憂鬱症狀有著相當重要的意義。研究者建議與低自尊的青少年工作時，應該著重於建立其內在的自尊程度，以利發展健康的人際交往與自我認同。低自尊的學生通常認為自己沒有優點且不被接納，在行為上經常有退縮、孤立的情形，教師應多加留意被孤立的學生，並且適時給予協助，教導正確的人際技巧。同時，班級經營應鼓勵學生發展多元興趣，提升自我價值感，透過參與活動以及與同儕互動的過程中看見自己的價值。校方則可以設置正向心理學相關講座或活動作為校園初級預防，透過自我肯定練習以及其他技巧提升學生自尊感以及其他正向特質（賴英娟、陸偉明、董旭英，2011）。



再者，結果顯示縱使親代憂鬱對子代憂鬱有負面影響，若子女更夠保有良好的親子關係，將能減緩親代憂鬱症狀所帶來的影響。儘管在父母帶有憂鬱症狀的情況下，若親子間能保持較佳的關係品質，將能減少親代對於子代憂鬱症狀的負面影響力。周玉慧（2015）指出，親子關係對於子女的心理健康有巨大的影響，在穩定支持的親子關係中，子女一方面會提高自尊、一方面會降低憂鬱；然而，如果在持續衝突的親子關係中，青少年的憂鬱程度則會明顯偏高。校方應作為促進親子關係的重要溝通橋樑，教師、輔導教師與心理師應協助家長與學生培養正確的溝通與傾聽技巧，使家長及學生保持開放、同理的態度，逐漸培養親子之間的相處方式與關係。

最後，學校歸屬感影響力雖不及自尊與親子關係，但也對於保護青少年心理健康有所助益，降低青少年的憂鬱症狀。過去研究發現透過有效的班級經營，能夠提升學生的學校歸屬感（阮孝齊，2015）。研究者建議教師能夠重視班級經營，吸引學生的投入與對學校的歸屬感，結合學生有興趣的議題作為活動主軸，才能真正使學生認真投入參與。校方也應重視學生的課外活動，如校際體育活動、各種性質競賽等，學生在學校除了課業之外，也能在其他活動中找到自我價值與成就感，在班級或學校中得到認同與歸屬感。

##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採用中央研究院所執行之「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TYP）作為本研究資料，由於人力物力之限制，採分層多階層叢集抽樣，僅以台北市、新北市、宜蘭縣三個縣市 40 所學校做為研究對象，因此推論至其它地區會有外在效度之考量，後續研究可擴大研究範圍。另外，本研究以受試者自評量表作為測量，建議未來研究可納入質性研究，如焦點團體，能夠獲得更加深入之資訊，更具研究價值。後續研究也可發展成介入性研究，繼續追蹤親代與子代憂鬱的家庭，並且根據研究結果發展介入策略，預防及輔導憂鬱代間傳遞的家庭。

此外，青少年的憂鬱背後往往有錯縱複雜的成因，本研究以自尊、親子關係、學校歸屬感作為研究變項，未來可針對青少年之憂鬱尋找其它變項，並且進一步探討變項之間與憂鬱代間傳遞的關係，以獲得更完整的研究結果，並且作為未來研究之參考建議。並且，由於本研究發現個變項之相關係數達顯著水準，但仍屬偏低，故再結果推論時宜謹慎注意，以及在未來研究上可著重提升測量工具之質量，用以提高測量各變項之精準程度。

再者，過去研究顯示，憂鬱代間傳遞其實並不只存在於親代與子代之間，也就是代間傳遞可能涉及親子兩代之外的其他世代 (Hammen, et al., 2004)，故未來研究亦可將祖父母一代之憂鬱症狀與相關變項加入研究當中，據以分析祖父母、父母、子女之三代的憂鬱代間傳遞現象，剖析更細緻的跨世代傳遞路徑。

最後，本研究係使用橫斷面資料的迴歸分析，未來研究也可以進一步採取高階的統計分析，例如縱貫性資料分析的潛在成長模式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探討憂鬱症狀代間傳遞的因果關係，使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之珍貴資料獲得充分的運用與剖析。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份

- 丁思惠、陳喬琪 (2006)。憂鬱症的婚姻與家庭治療。《**北市醫學雜誌**》，3(10)，954-961。
- 王迺燕、林美珠、周兆平、溫環椿 (2011)。高憂鬱症狀青少年之憂鬱疾患及自殺傾向：跨一年追蹤之研究。《**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4(1)，25-59。
- 王齡竟、陳毓文 (2010)。家庭衝突、社會支持與青少年憂鬱情緒：同儕、專業與家外成人支持的緩衝作用檢測。《**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3(1)，65-97。
- 王麗斐、杜淑芬、羅明華、楊國如、卓瑛、謝曜任 (2013)。生態合作取向的學校三級輔導體制：WISER 模式介紹。《**輔導季刊**》，49(2)，4-11。
- 伊慶春 (2014)。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國一樣本 (J1) 第一波，青少年問卷 (公共版)(C00176\_4)【原始數據】取自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 李佩珊 (2019)。Bronfenbrenner 生態系統理論的近期發展與應用。《**輔導季刊**》，55(3)，14-24。
- 李思賢、張弘潔、李蘭、吳文琪 (2006)。家庭及學校的社會資本與國小學童內化行為問題之關係。《**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9(3)，231-253。
- 李曉蓉 (1997)。青少年身體意象與自尊、沮喪相關之研究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市。
- 阮孝齊 (2015)。國中學生學校歸屬感影響模式之研究。《**當代教育研究季刊**》，23(3)，1-

34。

- 林杏足 (2003)。青少年自尊量表編製報告。《測驗學刊》，50(2)，223-256。
- 黃韞臻、林淑惠 (2008)。高中職學生學校生活與主觀幸福感關係之研究。《輔導與諮商學報》，30(2)，83-106。
- 林耀盛、李仁宏、吳英璋 (2006)。雙親教養態度、家庭功能與青少年憂鬱傾向關係探討。《臨床心理學刊》，3(1)，35-45。
- 紀櫻珍、吳振龍、洪嘉蔚、吳維峰、陳怡樺、邱弘毅 (2010)。臺北市高中生身體意象、自尊及其憂鬱之相關研究。《學校衛生》，57，41-66。
- 孫頌賢、李宜玫 (2009)。暴力的代間傳遞：原生家庭暴力經驗與依戀系統對大學生約會暴力行為的預測比較。《家庭教育與諮商學刊》，7，23-43。
- 常欣怡、宋麗玉 (2010)。機構安置少年之生活壓力對憂鬱情緒之影響：以自尊為調節變項。《社會發展研究學刊》，8，51-74。
- 陳婉萱 (2007)。華人憂鬱代間傳遞之縱貫性研究：家庭獨立性調節母親產後憂鬱對其學齡前兒童憂鬱症狀之影響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臺南市。
- 陳毓文 (2004)。少年憂鬱情緒的危險與保護因子之相關性研究。《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7(4)，67-95。
- 陳韻如 (2013)。離婚與婚姻不穩定代間傳遞研究之回顧與分析。《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6(4)，527-547。
- 齊雪芬、何慧敏 (2015)。兩代母親建設性教養行為之代間傳遞。《家庭教育與諮商學刊》，19，33-60。
- 蔡宗晃、詹毓玫、李家順 (2011)。低自尊與負面情緒對非行青少年的影響。《犯罪學期刊》，14(1)，1-29。
- 賴英娟、陸偉明、董旭英 (2011)。以結構方程模式探討台灣大學生自尊、生活目標、希望感及校園人際關係對憂鬱情緒之影響。《教育心理學報》，42(4)，677-699。
- 謝佳容、張珏 (2003)。青少年預防憂鬱和心理健康促進。《健康促進暨衛生教育雜誌》，23，129-136。
- 蘇曉憶、戴嘉南 (2008)。青少年完美主義、自尊與其憂鬱傾向之相關研究。《諮商輔導學報：高師輔導所刊》，18，123-154。

## 英文部份

- Ackard, D. M., Neumark-Sztainer, D., Story, M., & Perry, C. (2006). Parent-child connectedness and 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health among adolesc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30*(1), 59-66.
- Aiken, L. S., West, S. G., & Reno, R. R. (1991). *Multiple regression: 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 Newbury Park, CA: Sage.
- Anderman, E. M. (2002). School effects on psychological outcomes during adolescenc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4*(4), 795-809.
- Baumeister, R. F., Campbell, J. D., Krueger, J. I., & Vohs, K. D. (2003). Does high self-esteem cause better performance, interpersonal success, happiness, or healthier lifestyl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4*(1), 1-44.
- Beardseele, W. R., Versage, E. M., & Gadstone, T. R. (1998). Children of affectively ill parents: A review of the past 10 yea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37*(11), 1134-1141.
- Beck, A.T. (1967). *Depression: Clinical,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aspects*.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Boutelle, K., Eisenberg, M. E., Gregory, M. L., & Neumark-Sztainer, D. (2009).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connectedness and adolescent emotional functioning over 5 years.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66*(4), 309-316.
- Branden, N. (2001). *The psychology of self-esteem: A r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self-understanding that launched a new era in modern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 Bronfenbrenner, U. (1979). Contexts of child rearing: Problems and prospec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4*(10), 844-850.
- Brown, J., Cohen, P., Johnson, J. G., & Smailes, E. M. (1999). Childhood abuse and neglect: specificity of effects on adolescent and young adult depression and

suicidali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38(12), 1490-1496.

- Colarossi, L. G., & Eccles, J. S. (2003).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support providers on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Social Work Research*, 27(1), 19-30.
- Coopersmith, S. (1981). *Coopersmith self-esteem inventories: SEI*. Redwood City, CA: 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
- Costello, D. M., Swendsen, J., Rose, J. S., & Dierker, L. C. (2008).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rajectories of depressed mood from adolescence to early adulthood.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6(2), 173-183.
- Crook, T., Raskin, A., & Eliot, J. (1981).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adult depression. *Child Development*, 52(3), 950-957.
- Cummings, M. E., Keller, P. S., & Davies, P. T. (2005). Towards a family process model of maternal and paternal depressive symptoms: Exploring multiple relations with child and family functioning.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6(5), 479-489.
- Donnellan, M. B., Trzesniewski, K. H., Robins, R. W., Moffitt, T. E., & Caspi, A. (2005). Low self-esteem is related to aggression, antisocial behavior, and delinquency. *Psychological Science*, 16(4), 328-335.
- Dumont, M., & Provost, M. A. (1999). Resilience in adolescents: Protectiv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coping strategies, self-esteem, and social activities on experience of stress and depression.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8(3), 343-363.
- Ee, C. A., & Arshat, Z. (2017).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depression among adolescents in Selangor, Malay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Invention*, 6(10), 61-65.
- Galini, R., & Efthymia, P. (2009). Dimensions of the classroom climate, as perceived by the students, related to their teachers' evaluation approach on their overall performance in a Greek primary school sample. *New Horizons in*

*Education*, 57(2), 109-120.

Garber, J., & Cole, D. A. (2010).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depression: A launch and grow model of change across adolescence.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2(4), 819-830.

Goodman, S. H., & Gotlib, I. H. (1999). Risk for psychopathology in the children of depressed mothers: A developmental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mechanisms of transmiss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06(3), 458-490.

Goodman, S. H., Rouse, M. H., Connell, A. M., Broth, M. R., Hall, C. M., & Heyward, D. (2011). Maternal depression and child psychopathology: A meta-analytic review.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14(1), 1-27.

Hair, E. C., Moore, K. A., Garrett, S. B., Ling, T., & Cleveland, k. (2008). The continued importance of quality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during late adolescence.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8(1), 187-200

Hammen, C. (1991). Generation of stress in the course of unipolar depressio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00(4), 555-561.

Hammen, C. (1999). The emergence of an interpersonal approach to depression. In T. Joiner & J. C. Coyne (Eds.), *The interactional nature of depression: Advances in interpersonal approaches* (pp. 21-35).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ammen, C. (2002). Context of stress in families of children with depressed parents. In S. H. Goodman & I. H. Gotlib (Eds.), *Children of depressed parents: Mechanisms of risk and implications for treatment* (pp. 175-199).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ammen, C. L., & Brennan, P. A. (2003). Severity, chronicity, and timing of maternal depression and risk for adolescent offspring diagnoses in a community sample.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60, 253-258.

Hammen, C., Shih, J. H., & Brennan, P. A. (2004).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depression: Test of an interpersonal stress model in a community sample.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2(3), 511-522.

Hawkins, J. D., Catalano, R. F., & Miller, J. Y. (1992).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for alcohol and other drug problems in adolescence and early adulthood: implications for substance abuse preven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2(1), 64-105.

Heaven, P. C. L., Newbury, K., & Mak, A. (2004). The impact of adolescent and parental characteristics on adolescents levels of delinquency and depress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6, 173-185.

Katz, S. J., Hammen, C. L., & Brennan, P. A. (2013). Maternal depression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relational impairment.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7(1), 86-95.

Kernis, M. H., Grannemann, B. D., & Barclay, L. C. (1989). Stability and level of self-esteem as predictors of anger arousal and host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6), 1013-1022.

Kia-Keating, M., & Ellis, B. H. (2007). Belonging and connection to school in resettlement: Young refugees, school belonging, and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2(1), 29-43.

Moksnes, U. K., & Espnes, G. A. (2013). Self-esteem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adolescents: Gender and age as potential moderators.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22(10), 2921-2928.

Orth, U., Robins, R. W., & Roberts, B. W. (2008). Low self-esteem prospectively predicts depression in adolescence and young adulthoo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3), 695.

Osterman, K. F. (2000). Students' need for belonging in the school community.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70(3), 323-367.

Pittman, L. D., & Richmond, A. (2007). Academic and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in late adolescence: The importance of school belonging. *Th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75(4), 270-290.

- Roeser, R. W., Eccles, J. S., & Sameroff, A. J. (2000). School as a context of early adolescents' academic and so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 A summary of research findings. *The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 100(5), 443-471.
- Rosenberg, M., Schooler, C., & Schoenbach, C. (1989). Self-esteem and adolescent problems: Modeling reciprocal effec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6), 1004-1018.
- Rosenberg, M., Schooler, C., Schoenbach, C., & Rosenberg, F. (1995). Global self-esteem and specific self-esteem: Different concepts, different outcom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1), 141-156.
- Rounding, K., Hart, K. E., Hibbard, S., & Carroll, M. (2011). Emotional resilience in young adults who were reared by depressed parent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offspring religiosity/spirituality. *Journal of Spirituality in Mental Health*, 13(4), 236-246.
- Sheeber, L., Hops, H., & Davis, B. (2001). Family processes in adolescent depression.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4(1), 19-35.
- Shochet, I. M., Dadds, M. R., Ham, D., & Montague, R. (2006). School connectedness is an underemphasized parameter in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Results of a community prediction study.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 35(2), 170-179.
- Sowislo, J. F., & Orth, U. (2013). Does low self-esteem predict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 meta-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studi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9(1), 213-240.
- Weissman, M. M., Wickramaratne, P., Nomura, Y., Warner, V., Pilowsky, D., & Verdeli, H. (2006). Offspring of depressed parents: 20 years later.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3(6), 1001-1008.
- Werner, E. E. (1997). Vulnerable but invincible: High risk children from birth to adulthood. *European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5, 47-51.



- Whitbeck, L. B., Hoyt, D. R., Simons, R. L., Conger, R. D., Elder, G. H., Jr., Lorenz, F. O., & Huck, S. (1992). Intergenerational continuity of parental rejection and depressed affec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6), 1036-1045.
- Young, J. F., Berenson, K., Cohen, P., & Garcia, J. (2005). The role of parent and peer support in predicting adolescent depression: A longitudinal community study.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5(4), 407-423.

文稿收件 108 年 06 月 24 日

文稿一修 109 年 05 月 01 日

接受刊登 109 年 04 月 14 日

#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Depression in Adolescents: Protective factors in Individual, Family and School

Shou-Chun, Chiang、Li-Ya, Syu、Tsung-Shing, Liu、Wan-Chen, Chen

Master student, Master Program of Counseling and Guida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roles of protective factors in individual, family and school within the process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depression. Data was retrieved from a national survey named Taiwan Youth Project. Participants were 2,851 third year students in junior-high schools. Data analysis includes descriptive analysis,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female adolescents and those with higher level of parental depressive symptoms scored higher level of depressive symptoms. On the other hand, parents' gender and family status have no impact on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In protective factors, adolescents' self-esteem,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school belongingness could all reduce the level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moderating effect, self-esteem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could moderate the negative effect of parental depressive symptoms on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we discussed the meanings on education practices and suggested the improvement on individual, family, and school protective factors. Also, we urged to tak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depression as a serious issue and start to figure out the proper solutions.

**Keywords:** Adolescent depressio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protective factor